

后的土地与人民。他们的名字或许已被岁月尘封，但精神永垂不朽。

九三大阅兵那天，《义勇军进行曲》激昂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80发礼炮震彻云霄。镜头缓缓扫过天安门广场，扫过那些百岁抗战老兵，他们虽已白发苍苍，但举臂向国旗行着庄严军礼。镜头扫过接受检阅的年轻士兵，他们步伐整齐划一，口号响亮有力，英姿飒爽，传承着先烈们的精神，肩负起守护祖国的重任……我再次泪目，这泪水，饱含着对先烈们用热血铸就的和平的感激，也满溢着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祖国的热爱！

天安门广场上，和平鸽展翅高飞，带着我们的敬意与感恩，向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礼赞。（周璐）

念你如昔

□姜燕鸣

2021年初冬，我决定去一趟久违的汉正街。或因那篇写了3万多字的故事一直停滞不前，想寻找一下灵感和素材。

曾几何时，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对汉正街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曾号称天下第一街，是全国首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不断上演，名噪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商人们的故事。而我也在其高光时刻的20世纪90年代初，实打实地在此居住过几年，当时的家就在花翎巷里，从朝南的阳台越过层层叠叠的屋瓦，就能看到悠悠的汉水。我深深感受过汉正街的嘈杂和喧闹，狭长的石板路上，每天挤满了南来北往的打货人，他们在堆满五花八门小商品的店铺里与老板讨价还价，然后用蛇皮袋或大塑料袋子装好货物，或肩挑背扛，或用板车、三轮车推着，在摩肩接踵的石板路上缓慢前行，时常因来往的车辆阻碍，被挤得动不了……这样的情景，我曾在长篇小说《汉口之春》与中篇小说《小巷里的女人》中有所描述，那种热腾腾的人间烟火，醇厚而深长，一直留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然而，当我再次走进汉正街时，已是另一番面貌，曾经热闹拥挤的狭长老街已不见了踪影，道路都扩展了，高楼大厦取代了高低错落的老房子，充满了时尚气息，商铺也都搬进了楼内，成为商城。我独自走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恍若隔世。一直到大夹街深处的药帮巷，才找到一些旧时的痕迹，那条硕果仅存的青石板路，蜿蜒百米来长，两旁依旧是老房子，市二色织布厂的四层白楼所幸还在，我在那门前站了好一会，回想曾外祖父、外祖父曾从这里进进出出，不免思绪万千。

不知不觉间，脚下的青石板路在延伸，狭长的正街望不到头，店铺招牌密密匝匝，烟气袅袅，人声喧闹，我穿行在人流中，又进入了当初的情景，也似乎坠入了前世。

突如其来的创作灵感也在那一瞬间电石火花般闪现。然而，祖辈在此耕耘的情景于我还是陌生的，这不禁激起我探寻的欲望，但查找的资料和一些文学作品多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汉正街，此前的内容寥寥无几，唯有清代竹枝词记录一些曾经的景象。但药帮巷让我的思绪得以拓展，我想跳出80年代的模板，向更悠远的岁月回望。

这自然是了解历史后的拓宽。都知道武汉分三镇，从隋代这里就形成汉阳、武昌“双城夹江”的格局。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劈出一个水汪汪的汉口，随后各处商民渐渐在水口两岸建房造屋，商船来此停泊，从满滩芦花、鱼跃鸢飞的泽国迅速发展崛起。从明嘉靖到清嘉庆二百余年间，汉口从一个荒洲跃升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为“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的“楚中第一繁盛处”。汉口因河而兴，因商而活，“十里帆船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写的就是当时汉口水口（汉正街一带）的繁荣景象。汉正街是汉口之正街，也是设立许多地方官署的官街，汉正街是汉口商脉，是汉口的城市之根。尤其是汉口开埠之后，武汉联系了广阔的外部世界，随着西风东渐，洋务运动在武汉应运而生，自此，武汉城市才真正步入近代，才有了城市性质和社会的转型，使汉口由封闭型的封建商镇，演变为开放型的具有一定近代文明的大都会。但历次的战争，汉正街与汉口城市一样，屡遭重创，也总能浴火重生。到了20世纪20年代，汉口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长江航运和京汉铁路两擎并驱，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

于是，我又开始续写那部停滞不前的小说，将女主人公暹春出生的丁卯年（兔年）作为小说的起始，也正是不同寻常的1927年，北伐军在武汉建立了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虽只有短暂的几个月，但对武汉影响深远。也是这一年，三镇才正式有了武汉市的命名。

我时常去汉正街的街巷里穿行，也去汉阳洗马长街附近寻访，捕捉那些旧时的味道，如果遇上一两位老街坊，如见故人，会慢慢地倾听对方讲述曾经的往事，日光悄然无声在斑驳墙面上移动，将所有沧桑变成金色岁月的风物，那些往事也成为小说里的情景。我的脚印也变为主人公暹春的足迹，在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上延展着，如同她颠沛流离的命运，从汉正街到洗马长街，她眼里的情景渐渐变成了长长的画卷，迤迳如一条无尽的长河。

有时我想，武汉究竟是座怎样的城市，能驱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抒写，说不完，道不尽。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触摸历史的过程，逐渐发现这座城市厚重的底蕴，武汉从1986年就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真不是浪得虚名。如果一座城市让人一目了然，让今天的人感受不到更多的历史传承，无疑是可悲的。武汉确是一座一言难尽的城市，她的人文历史，她的得天独厚，她由大江大河滋养的风情和性格，由此呈现出今天不一样的魅力和特征。

甲辰年的阳春三月，我已完成了长篇小说《暹春纪》，特地去汉阳龟山浏览，因汉阳的洗马长街也是小说的重要背景，我在小说里对清初名士毛会建先生也有所描述，就想去寻其遗迹。毛会建先生在学界被誉为“书法通晋魏，六书篆皆精绝”的金石书法家，其书法苍劲，类颜鲁公。毛会建也是位探险家。嗜奇癖古，游迹几周天下。他曾到衡山岫峰岭历经千辛万苦寻得世间珍品大禹碑，并勾填后篆刻在龟山。毛先生晚年居住汉阳晴川，曾在龟山周围遍植树木，相传汉阳离碑亭东面一棵巨大的古椿树就是他栽种的。我在《暹春纪》中，也收入了毛先生的《晴川朴树》诗。他在《晴川朴树》诗自跋中曾写道：

自崔先生《崔颢》《黄鹤楼》诗而晴川以树闻，历千百年以至今，何濯濯也。予乞诸万木园，得榆、柳、柏数种补之，清川绿树，一时掩映，倘亦好事者之所为歟？

崔颢的一首《黄鹤楼》让晴川树名满天下，然千百年后，龟山已濯濯然也，所以毛先生补种树木，力求千百年后绿树成荫，枝干交错，再现“晴川历历汉阳树”的风貌。

如今的龟山已是层林叠翠，我在花红绿柳中漫步，想毛先生安眠在这片茂密丛林中，也会含笑九泉了。然而我却没找到毛先生的墓碑，唯有曾立于蛇山抱膝亭前的黄兴铜像转移于此。漫步上山来到对面的晴川阁里，凭栏眺望，蓝天白云下，一条大江闪着金光汨汨流淌，静静穿过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不觉庆幸将建设长江大桥的情景做了《暹春纪》的小说情节。

晴川阁大殿里，中央挂匾的“山高水长”四个遒劲大字，正是毛会建先生所书，两旁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晴川阁所撰楹联“洪水龙蛇循轨道，青春鸚鵡起楼台”，由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先生书写。流连之间，发现晴川阁外也树有一块“山高水长”的石碑，与大殿内的四字相同，皆从西安碑林的原碑拓印而来。走近一看，上款题写：康熙甲辰行醉日。我订着甲辰二字，一时惊住，怎就这么巧，竟也是甲辰。蓦然发觉，把毛会建写进小说里，也像有只手在指引着我。一些人物的出现，也并非我刻意而为，至小说完成之后，才知道是带着使命而来。

乙巳年的阳春三月，我重游西安碑林，特地去寻找毛会建所书“山高水长”的原碑，抚摸着那碑上精雕细刻的字迹，禁不住泪眼婆娑。耳边似有人在吟诵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是晴川绿阴下借酒挥毫的毛会建，还是受先生之风浸润的暹春，抑或是不不断进取的每一位武汉人，皆聚成那座英雄辈出的城市，岁月更替，风华依然。

当和平鸽展翅高飞

一位年轻同事告诉我，读《抗日战场上，那未曾谋面的相遇》地落泪了。此前，她看过电影《八佰》，影片展现的就是1937年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以血肉之躯直面强敌的英勇壮举。“电影用艺术手法重现历史，历史于我遥不可及，电影里的演员却是我熟悉的，时刻提醒着我正身处电影院。可我读到这篇文章，一个个被列出的英雄姓名真实具体地呈现在眼前，我眼睁睁看着21岁的敢死队队员陈树生捆着手榴弹从五楼跳下与敌同归于尽……”

她的话，何尝不是我的心声？我们，甚至我们的父辈，都幸运地成长在祖国日益强盛的和平年代，未曾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无情，难以真切体会先烈们为何能前赴后继、义无反顾。那些本应有着美好未来的热血青年，毅然决然地奔赴战场，只为了守护身

晨，谢晋元被汪伪汉奸收买的四个叛徒刺杀，不幸牺牲，时年37岁。一代英雄没有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却死在了汉奸的刀下。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上海10万民众前往瞻仰遗容，表达崇敬之心。谢晋元被通令嘉奖，并被追晋为陆军少将。毛泽东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典型。

“八百壮士”的幸存者后来陆续落入日军之手。慑于壮士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他们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力，日军一直不敢轻易下毒手，但将他们陆续分散押解到诸暨、杭州、南京做苦工，一些人被塞在船上送往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等地做劳工，不少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成功地逃出魔掌，有的加入了新四军抗日游击队，有的到了重庆安全区，有的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滇缅作战，有的解甲归田回到家乡。也有一些人留在上海，在谢晋元团长遭屠戮维诚的帮助下，在大码头从事搬运工作，自食其力。

有一位“八百壮士”中的幸存者，是我的家乡赤壁中伙铺烟墩村的人。

他叫田有收（1918年—1998年），又名田际钿。对，就是电影《八佰》中那位大声自报姓名“田际钿”的士兵，当时是524团一营一连三排中士。1942年秋，田际钿等36名战友被日军押解到澳大利亚的一个荒岛上服役役，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生活，终于有了逃出的机会。1946年12月，田际钿辗转上海回到家乡赤壁，从此在家务农，他当年的英雄事迹陆续被人们知道。一位乡贤告诉我，田际钿是他的表叔，小时候听他唱过谢晋元团歌，他一直用红布包裹着524团的团徽，常放在胸前的口袋里。1998年10月，田际钿老人在家乡去世，享年80岁。

之后的2010年12月，“八百壮士”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祖籍湖北随州、当年524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杨养正，在重庆去世，享年96岁。

青山有情埋忠骨，八百壮士方犹在。新中国没有忘记他们，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2014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谢晋元等“八百壮士”和所在（1937）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524团，被追认为英雄群体。

四

这里，我还要讲述另外一个故事。在四行仓库抗击日军最紧张的时刻，524团一营的咸宁籍战士们完全想不到，当他们屏住呼吸瞄准射击侵略者的同时，不远处有一位戴眼镜的文弱书生，紧盯着他们。他怀里抱着的不是枪，而是照相机。他的名字，叫舒宗侨，战地记者，蒲圻人，即今天的赤壁人。他们未曾谋面，却在抗日的战场上相遇。同为家乡人，同为中国人，他们的心聚在一起，热血流在了一起。舒宗侨，今赤壁杨家人岭人。1932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早的新闻科班出身的记者之一。1935年到1937年10月，他担任上海《立报》记者；1937年10月到1939年9月，他受聘担任苏联共产党新闻机构塔斯社的记者，积极向国际社会报道中国抗战的消息，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宗仁、张自忠、冯玉祥等重要人物，与邵力子、戈宝权、范长江、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文化名流有工作交往。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复旦大学任教，直至2007年3月，这位“中国新闻教育界最年长的教授”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

抗战期间，舒宗侨以文字和摄影为武器，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他写作和拍摄了大量作品，主办进步报刊，冒着被逮捕、暗杀的危险，在上海国统区公开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主张和功绩。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日军基地，太行山击毙“名将之花”，挺进江南、开展百团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图片资料，通过舒宗侨和同仁之手，扩大了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影响。

淞沪会战期间，舒宗侨正在上海，担任《立报》记者和塔斯社记者，时刻关注着战况。著名报人曹聚仁此时也在报道四行仓库的情况，还冒险住进了四行仓库二楼。他们亲临现场对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报道传遍了世界。后来舒宗侨与曹聚仁共同编著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二次大战战略精华》《学生解放运动画史》等，为中国抗战史、人类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史留下宝贵资料，其中不少作品成为传世经典。1948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在上海审讯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时，审判长面前就放着他们编辑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两本刊物，其中许多照片成为日军侵略中国的铁证。

舒宗侨是历史的见证者。前文说到，当年谢晋元副团长希望得到一面国旗，后来悬挂在了四行仓库的顶上。这是历史的真实，极大地振奋了国威军威。这面国旗是小姑娘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送到四行仓库，当面对谢团长和杨营长的。但回忆送旗的过程，出现了多个版本。上海中医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回忆道：“突然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很勇敢地用油布包了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泗水到达对岸。把她带的一面国旗送入国军手中。”而一位英国工程技术人员回忆：“当时连接苏州河南北两岸有一根直径达75厘米的管道，是他亲自带着杨惠敏通过管道爬行到对岸的。”这段回忆被国民记者海默写成消息稿，配上了杨惠敏的照片，刊登在当时的《时代》周刊上。

而根据曹聚仁、舒宗侨合著的《中国抗日画史》中记载，“女童军杨惠敏送国旗不是游苏州河过去，而是经由隔壁大楼凿开的墙洞过去的”。杨惠敏事后在武汉发表的《自述》被回忆说：“当我负着神圣的使命走到垃圾桥附近时，被一英军阻止了。经我多番辩论后，我终于在这英兵的许可之下爬过了铁丝网，随后匍匐在地，爬过了许多沙包堆，约两小时之久，我终于爬到了四行仓库，将国旗献给了谢团副和杨营长。”这两种说法有较高的可信度，且能前后衔接。

历史的潮水铺天盖地，人们只会记住浪头的趋势、潮头的精彩，瞬息万变的浪涌细节和漩涡的形状，可以留给大海去回忆。

记者也是战士，是历史的见证者，是精神、意志、力量的记录者。据赤壁市文史工作者回忆，1987年，舒宗侨教授把自己珍藏了50年的照片胶卷，寄赠给了家乡赤壁留存。

“八百壮士”和舒宗侨的故事，让我为家乡而自豪。他们，都是书写历史的英雄。

那一场不曾谋面的相遇

抗日战场上

□刘汉俊



出击（版画）

吉林 作

攻。10月28日清晨，十几个日军士兵偷潜至四行仓库墙下，企图埋炸药炸开铁门和墙壁，狡猾的日军用两块大铁板做掩体，火力不能直接到达。紧急关头，中国守军、21岁的敢死队队员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五楼纵身跳下，拉开导火索后立即钻进掩体，与敌人同归于尽。当年只有14岁的上海作家沈寂，家住新闸路口，隔苏州河对岸就是四行仓库，目睹了这一悲壮的一幕：“用望远镜观望，亲眼目睹，一位战士全身挂满手榴弹，从空中跳下，炸死日军。这些惨烈的战斗场景，我终生难忘，应永载抗战史册。”山河破碎，家国遭难，血性男儿只能以命相拼。

三

有血性的，不只是中国男儿。由于进驻时匆忙，部队没有携带当时的国旗和军旗，为鼓舞士气，谢晋元希望得到一面国旗。消息传到苏州河对岸，上海商会的爱国企业家迅速赶制了一面大大的国旗，由勇敢的小姑娘杨惠敏送到四行仓库。10月29日凌晨，这面旗帜在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四行仓库的屋顶升起，显示出中国守军要与日本侵略者死战到底的决心，目睹这一幕的许多中国人，流下了悲壮的眼泪。杨惠敏是江苏镇江人，曾于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暨中山大学体育系求学，1937年加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队。她冒死献旗的壮举，登上了上海各大小报纸的头条位置，轰动了一年的上海滩和国内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战的民心士气。

面对日军飞机、坦克、大炮更猛烈的轰炸，“八百壮士”坚贞不屈，誓与阵地共存亡，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10月31日，由于寡不敌众、孤立无援，且掩护任务基本完成，“八百壮士”奉命冲出重围，退入英国租界内。至此，他们已坚守了阵地四个昼夜，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消灭日军200多人，整个战斗中无一人退却、逃跑。日军司令松井石根原以为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至少有一个旅、二三千人的兵力，当获悉重创他的第三师团的中国守军仅有400人时，面露尴尬。

“八百壮士”的英勇表现，令日军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勇敢顽强，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也为国际社会“九国公约会议”的“同情”并调停干预侵略者的行径，争取了时间和主动。这也是蒋介石留在上海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但这粒“棋子”宁碎不移，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撤退出来的壮士很快落入了西方列强之手，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被限制在西方国家秘密设置的“孤军营”，达四年之久。随着形势的变化，日伪日趋猖獗，汪伪政权看中了谢晋元及所部的抗战精神在中国军队中的影响力，汪精卫多次下令劝降谢晋元，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亲赴孤军营劝降，以“陆军总司令”一职相诱惑，结果受到谢晋元“你们是狗汉奸”的怒骂，委任状当场被谢晋元撕了个粉碎。不幸的是，1941年4月24日清

江花

一

这是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真实的故事。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

七七事变发生后，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加紧备战并蓄意制造事端。1937年8月9日，两名日本军人擅自驾车持枪闯闯虹桥机场警戒线，在逃窜中被先后击毙，成为战争的导火索。8月11日下午举行的谈判中，日方代表蛮横地提出中方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遭中方严词拒绝。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立即命令早已待命的日舰开进黄浦江、长江各口岸，并布置全舰队紧急开赴上海待战，同时命令在日本佐世保待命的海军第一特别陆战队等火速开赴上海。

中国政府及军队态度坚定，毫不示弱。张治中部得到命令于8月11日当晚9时开进上海，作好战斗准备，第87师、第88师、第22旅迅速从常熟、无锡、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市区附近，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母有难，子来救。国遭劫，兵何寝！8月12日上午，张治中部先头部队迅速进入上海市区，抢占有利地形。8月13日，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战争，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军委会命令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三个师一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地区日军的任务；驻苏、浙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担负阻击浦东地区日军的任务。8月23日起，日军的大批增援部队从各个方向抵达，双方在罗店、宝山等地展开激战。9月10日，日军兵力增至10万以上，中国军队也持续增援。日军攻占吴淞口及沿江防线后，于9月30日发起总攻，双方以大场为中心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大场失守，主力部队受到威胁，准备撤到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决定，命令第88师524团坚守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转移。

日本方面，裕仁天皇命令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第3师团、第11师团等军直属部队进攻上海。而此时的蒋介石还在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进行干涉，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要求置若罔闻，中国军队因此延误了撤退时机，下令撤退后又出现了指挥混乱，导致三四十万中国将士拥挤在几条狭窄的公路上，被日军空军狂轰滥炸，损失惨重。大撤退变成了大溃逃，为南京保卫战的失利、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埋下了隐患。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中国方面投入最精锐部队浴血奋战三个月，以巨大牺牲和惨痛代价彰显了抵抗侵略的坚强决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尊敬，也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计划。淞沪会战惊心动魄的三个月，中国军民凝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

二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前文提到的，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第72军88师524团第一营的“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英勇壮举。

对，就是电影《八佰》所表现的那个英雄群体和那一场惨烈的战斗。

编制号称为“一营”，实际上是指挥官高配为副团长谢晋元，营长为杨瑞符；队伍号称八百人，其实只有400人左右，亦有420人、455人、380人、412人之说。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1905年生，1922年考入广州国立高等师范，1925年底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0月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35年任第88师补充团中校营长，奉命驻守四行仓库时已是副团长。

我想说的是，这支承担驻守任务的队伍，大部分人是我的同乡，他们来自今天的湖北咸宁及周边地区。

当时的咸宁一带隶属于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辖区11个县，范围覆盖过去的咸宁行署各县，区专署设在蒲圻县，即今天的赤壁市，我的家乡。这些官兵原属通城保安大队，许多人来自过去的咸宁、嘉鱼、蒲圻、通城、崇阳、通山等各县，以及今天的湖北随州、监利等地，还有一些人来自外省，士兵中通城人最多。淞沪会战之前，这支保安大队被调到蒲圻训练，后转武汉集训，编入湖北省保安五团。集训数天后，他们奉命开赴上海，被补充到88师524团第一营。能找到姓名、亲属，属于今天赤壁籍的士兵中，有中伙铺的田际钿、邓才福、吴炳元、刘炳秋，杨家岭的任任壮、谢邦银，黄龙八屹畈的任贤清，吕国斌，羊楼洞的余长寿，车站的江尚阶、罗通海，琅玕桥的何寿山、罗国通，随阳的陈文山、雷炳林，斗门桥的李昌生，神山的邓贤青，宋家河的温泰山，蒲圻城关的刘秀亨，团山的张其发，新店的周大发，等等。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新兵，刚学会打枪，没有上过战场。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苏州河北岸，是民国时期上海的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四家银行储蓄会的堆栈。建于1931年，是一座宽64米、深54米、高25米的六层楼房，钢筋水泥结构。仓库的东南两面，毗邻公共租界，租界里居住着受到保护的英美俄等国侨民及部分中国人，以及外国驻沪机构。

谢晋元接到命令后，立即致函师长孙元良：“在未完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怠急；待任务完成后，决作壮烈牺牲以报国家”，表达了与日寇拼死一战的决心。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在上海保卫战十分被动、中国军队主力部队不得不撤出上海的情形下，中国军民士气已降至低谷。四行仓库保卫战被视作一场“丢卒保车”，注定要失败的绝命之战。

1937年10月26日深夜，谢晋元率官兵悄悄进驻四行仓库，这里曾是第88师的师部。他命令一营各连清点人数造好名册上报，以备牺牲后按名单抚恤家属。谢晋元知道，他们的对手，是日本陆军大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来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松井石根，以及他亲自指挥的日本王牌军第三师团，凶多吉少，活的希望渺茫。但凶残的敌人，吓不倒有血性的中国人和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拖住敌人就是胜利。

10月27日午后，四行仓库保卫战打响。日军以多出中国兵力十倍的架势向中国阵地发起进攻，一营许多小战士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日军，第一次开枪射击敌人，但他们顽强坚守、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